



晋中日报
晚报版

10

人文读本

之

晋商行

2020.6.8
星期一

编辑

孟佳琪

校对

张璐

传奇晋商——

日昇昌兴衰浮沉

(上接第9版)

河山满目终觉空

似乎是中了“物极必反”的法则，高峰的到来也就是末日的开端。随着列强的入侵，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既不能与外商相抗衡，商业场所又遭到大面积破坏，财富更是被大肆掠夺，以脆弱的民族资本对抗大举进入的外国资本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金融危机、商业危机已经不可避免。

整个票号业，从1911年(辛亥革命)后，就开始整体性走向衰落，到1922年仅剩4家，1951年全部停业。直到1995年，才利用日昇昌总号旧址，开辟为我们现在能看到的——中国票号博物馆。

最初的时候，票号的主要业务是汇兑，存款、放贷还在其次，可见其功能着重于贸

易过程中流动资金的筹集。如果说票号发展前期的盈利主要来源于汇费收入的话，其中后期的盈利则主要来源于放贷利息收入，并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资本的雏形，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纵观整个山西票号，“信义经商”是贯穿其始终的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京官纷纷携眷出京，当时西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路经平遥时，不少随驾官员向蔚盛长等票号在平遥开设的临时京庄索取费用，各票号为维护自己的信誉，团结一致，及时应付官员，兑付现银，分毫不差，不露破绽。庚子战乱是各票号损失惨重的一次，但由于票号拿出备防之款，无论京津、

上海，还是山西、汉口等地，对持券者全部满足兑现，此举更加赢得了声誉。

日昇昌票号在二次革命的时候，欠外数目约五百万，欠内之数七八百万，出入相抵，有盈无细，但贷款难以收回，成本早已付之东流，可是为了维持信用，面对储户三年之中均为停利。辛亥革命前后，中国票号整体性走向衰落，侯家经营的票号每况愈下，各地分庄被抢、被烧，倒闭的消息纷至沓来，各地存款户纷纷提款，形成挤兑，此后票号大势已去，开始了艰难维持的十余年。其中，值得一提的是，1930年，蒋阎冯中原大战结束后，晋钞严重贬值，约25元晋钞才能兑换一元新币，如果对存款户以晋钞兑出，那么票号便可乘机发一笔横财，但是，以日昇昌票号为首的众多票号没有这样做，并且不惜动用历年公积金，在储户提款时，如数兑出新币，维护了票号的信誉，守住了商人的“道德红线”，真正做到了“宁叫赔折腰，不让客吃亏”。

与此同时，鸦片战争后，随着中英《南京条约》的签订，清政府被迫开放口岸，使得外来资本轻松进入我国。西方银行，开始了与票号的激烈竞争。随后，清政府官办银行(户部银行)的成立，垄断了几乎全部官银汇兑业务，对山西票号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。

列强资本的注入、现代银行业的不断建立、清王朝的瓦解，日昇昌逐步走向没落。1914年，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昇昌票号宣告倒闭，这对当时中国的金融业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。经国民政府司法部、农商部干预，日昇昌被批准暂免破产，对各分号进行全面清理，事实上，清理工作一直延续到1922年。已是体虚脆弱的日昇昌，再也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。到1932年，经由债权人主张，由债权人、债务人共同合营，日昇昌票号被迫改成了日昇昌钱庄，经营规模大为收缩。1949年，平遥解放前夕，日昇昌彻底摘牌。

如今，行走在平遥古城西大街上，曾经在近代中国金融界显赫一时的日昇昌，旧貌依存，原物依旧，向徜徉其间的人们叙述着19世纪以来中国金融业的兴衰成败，时事沉浮。



中国票号博物馆展品